

中国小康社会建设40年： 历程、经验与展望*

□ 韩保江 邹一南

摘要：“小康”目标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2月会见来华访问的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至今已整整40年。40年的小康社会建设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主旋律。本文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的历史节点，梳理回顾了40年来小康社会建设从目标提出到全面建成的4次历史性飞跃，将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经济发展在各项事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目标导向、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根本途径。2020年将开始实施“十四五”规划并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应继续发扬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用“发展”提供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用“改革”破除现代化进程的艰难险阻，用“全面”引领现代化道路的前进方向，用“质量”设定现代化水平的更高目标，用“美丽”扮靓现代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关键词：小康 现代化国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DOI:10.19744/j.cnki.11-1235/f.2020.0003

“小康”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阶段性目标。当前，小康社会建设已到了最后的冲刺和收官阶段，抚今追昔，回顾40年来小康社会建设的理论演进脉络和实践历程，总结成功经验，对于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4次历史性飞跃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中，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生活非常辛苦，应予以休息安乐。《礼记》对“小康”一词讲的更详细，是指一种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生活状态，是作为理想社会最高形态的大同社会的初级形式。因此，以“小康”一词来定位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把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的睿智创造（中央文献研究室小康社会研究课题组，2010）。小康社会目标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过去40年，小康社会目标经历了4次历史性的飞跃。

（一）“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新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国情和文化不同于西方国家，通往现代化之路必然是一条独具特色的“长征之路”，不仅会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会面临许多复杂多样的风险和挑战。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党的几代领导人虽然对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也提出了不尽相同的实施方案，但目标几乎都是快速追赶发达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因此，这“四化”也就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6ZZD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9CJY012)的资助。

民为之奋斗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到改革开放前夕,虽然中国通过国家工业化的积累初步建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长期坚持僵化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尤其是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及其极“左”的思想路线,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无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所以,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很难如愿以偿。

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反思,邓小平同志从中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出发,十分务实地修改和调整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称之谓“我们开了大口”。进而他也创新性地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是“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979年12月,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小康之家”,并将其界定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内涵”。具体来说,就是到20世纪末,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邓小平,1994)。在“小康”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了建设并进入“小康”的时间表,即到2000年的时候,在经济上要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相对于1980年的水平翻两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a)。对于小康目标的实现方式,中央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小康”建设事业的总体布局初步形成。

“小康”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提出,是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第1次历史性飞跃。它使中国的发展跳出了以“先生产、后生活”为特征的“赶超型”战略窠臼,走上了经济与社会相协调的“渐进式”现代化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下,中国按照“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需要,建立起了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僵化的微观经营机制(林毅夫等,2002),农轻重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很低。正是在“小康”目标提出之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经济建设逐步调整了偏军、偏重的结构,实施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改革了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应该说,小康目标的提出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更是20世纪新中国国运的重要转折。

(二)从“温饱”到“小康”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时,基于对我国“绝大多数实现温饱、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生活迈进”基本现实的判断,党中央提出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即第一步是到1990年,彻底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在经济总量指标上,经济总量要实现比1980年的水平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达到小康之家的水平,在经济总量指标上,要实现GDP再翻一番;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要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并且对标国际水平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这个宏伟的战略安排下,小康目标在“三步走”中被列为第二步,由此成为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党的十三大还提出了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b),为后来逐步形成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打下了基础。在全党全国人民20多年的戮力同心和艰苦努力下,“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两步目标如期实现:到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突破10万亿元,比1978年扩大了27倍;人均GDP接近8000元,约合945美元,比1978年提高了约4倍,“翻两番”的目标圆满完成^①。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跨越。

从温饱到小康水平,是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第2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贫穷。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中国沿着小康生活的目标开启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沿海经济特区建设如火如荼,劳动、资金等生产要素开始充分流动起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中国用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有力地诠释着社会主义的本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正是基于10年小康社会建设的初步成果,为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打下了强心针,战胜了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空前挑战,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不仅如此,小康中国开始以更加自信的面貌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开始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邓小平同志曾说,当中国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后,将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与世界建立更为紧密的贸易

联系(邓小平,1994)。诚如邓小平所言,在2000年之后,完成了从温饱到小康历史性飞越的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越发密切,展现给世界的面貌也日新月异,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蒸蒸日上。

(三)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

进入21世纪,完成了“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向第三步迈进。由于“三步走”战略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现实条件,根据“远粗近细”的原则设定的,因而对于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如何进一步细分,以及选择什么样的途径去实现,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根据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实际,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细分为3个阶段性目标,形成了一个新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在21世纪的前1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第二步,再过10年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江泽民,2006)。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我国将从新世纪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发展阶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c)。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由总体小康转向了全面小康。在党的十六大上,中央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即:要到202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d)。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朝着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为再次强调了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并将2020年定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节点(胡锦涛,2016)。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发展了小康社会的内涵,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总布局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范畴,形成了四位一体的总布局。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是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第3次历史性飞跃。“小康”有水平高低之分,而在世纪之交时中国人所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首先,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约10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还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仍然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其次,发展很不全面。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的发展中,我们急于摆脱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推动物质财富的积累,片面注重经济的增长,而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区域协调、城乡共享方面留下了很多欠账,尤其是对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不够。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虽然比过去有所提升,但对社会公平正义、环境健康舒适、生活安定有保障等方面的满意度普遍较低。再次,发展很不平衡。从全国范围内看,很多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仍然未得到彻底解决,在新的扶贫标准下的贫困发生率还比较高,城市中很多下岗职工仍然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差别出现拉大的趋势。因此,总体小康水平必须更进一步,向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要全面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d)。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不仅强调经济的发展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更强调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民生福祉的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它是认识的深化、理论的发展、目标的提升和追求的升级。

(四)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之后,小康社会建设进入到了全面建成的决胜阶段。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了新要求,在经济指标上,要实现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8)。党的十八大进一步丰富了小康社会的内涵,形成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十八届三中、四中、六中全会分别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在党的十九大上,基于新“三步走”的第二步已接近完成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未来3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次进行了阶段划分,即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第4次历史性飞跃。从“建设”到

“建成”，虽然只有一字之变，但意义重大。一方面，它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基于30多年小康社会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而形成的对如期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诺的信心。这个信心来源于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来源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所带来的人民群众的坚定拥护，来源于党的建设的决定性进展所带来的执政能力的显著提升，来源于依法治国全面推进所带来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来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所带来的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来源于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带来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等等。另一方面，它也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能够继续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决心。向全世界宣布“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就意味着前40年的任务告一段落，未来将开启一段全新的航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绝不会是一帆风顺，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只有有勇气、有能力的执政党才敢于掀起新的历史篇章。从“建设”到“建成”这一字之差，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敢于担当的时代精神和日益成熟的执政能力。

二、40年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

40年的小康社会建设经历了从总体到全面、从低水平到高水平、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发展过程。到2020年，我们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回首小康社会建设走过的道路，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梳理和总结，这对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重要意义。

（一）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改革开放尤其是小康社会目标提出40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人均GDP近1万美元并成功步入世界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小康社会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世界罕见的巨大成就，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够大幅度提升，都同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作用是分不开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

党对小康社会建设的领导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方向指引。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理性地提出我们要建设“小康之家”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来，党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都把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小康社会建设作为奋斗目标和最重要的工作部署，党的十三大明确将“人民生活进入小康”作为“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党的十四大则把“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确立为“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向更高水平前进”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任务和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20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则以“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为政治报告标题，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了全面部署；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党的十九大更是鲜明地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习近平，2017a）。正是由于我们党提出并率领全国人民始终沿着“建设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向努力奋斗，才取得了今天如此辉煌的发展成就。

二是理论武装。科学理论既是成功实践的先导，又是成功实践的保障。我国建设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始终是在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地用新的理论武装头脑，从而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的。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指引各项事业的建设尤为重要。曾经的超级大国苏联，其执政党苏共就因为长期忽视了党的理论建设，最终导致政权的丢失。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党的理论学习就在主观上被弱化，在客观上一元化、教条化、封闭化；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而脱离实际的理论建设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没有纠正斯大林时期“超越阶段”的理论指导思想，反而一再提出要在较短时间内“基本实现共产主义”，并且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机械地将“重工业优先发展”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党的理论建设更是无视20世纪80年代苏联国内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盲目推动“新思维”，将前期理论建设的混乱和困顿

最终转变为彻底的失控与崩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长足进步、在历史洪流中牢牢地把握时代大局、在关键节点上稳稳地举旗定向,一定程度上正是从苏共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注重开拓创新、开放交流、与时俱进,使党的理论能够成为引导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旗帜鲜明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并实现“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作为自身“初心”和“使命”,形成了一系列促进“建设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路线、基本制度、基本理论和基本策略,从而确保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是组织保证。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策,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邓小平,1994)。这里的优越性指的就是“党的坚强而有力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可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这一点在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治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从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尽快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了18个贫困片区进行重点扶持,并开展了“以工代赈”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到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应成立了负责本地扶贫开发工作的机构。同年开始实施的贫困县制度,使我国的扶贫思路从“人口瞄准”(即政府对贫困人口的直接救济)转向“区域瞄准”;再到1994年出台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力争用7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再到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出台,使我国扶贫工作开始由以县域贫困瞄准转入村级瞄准的新阶段,同时把贫困人口集中的“老、少、边、穷”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再到2011年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进一步在全国划出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将其作为新时期扶贫开发的主战场,直至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打响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明确强调“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统筹制定脱贫攻坚大政方针;省级党委和政府对本辖区内脱贫工作负总责;市(地、州、盟)党委和政府要做好上下衔接、域内协调、监督检查工作;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同时,每个贫困村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有帮扶责任人,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包括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对口扶贫在内的多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无不具体体现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显著优势。也正是由于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使得我们在短短40年来创造了累计减贫5亿多人口,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左右,从而确保2020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人类发展奇迹。

(二)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2014)。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显著特征和优良品格,也是小康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时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是40年小康社会建设能够始终找准时代方位的根本保证。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运动的形式也在随时间不断发生着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初,解决温饱问题、迅速摆脱贫困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最为迫切的需求,为适应这一需求,国家允许农村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给予乡镇企业宽松的发展环境,适时启动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温饱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开始超越单纯的物质层面,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越发强烈,为适应这一需求,国家赋予了小康社会建设更为丰富的内涵,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政治权利和精神文明建设放在更突出的位置。进入21世纪之后,鉴于人民生活水平只是在总体上达到小康,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各领域发展不全面、区域和城乡之间不平衡等现象十分普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民生保障、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反哺农村的重大

战略部署,将社会和谐进一步纳入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之后,鉴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越发强烈,国家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之后,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涉及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更是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健康、安全和生活环境等方面有了更全面的要求。近年来,国家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市场、公共交通、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领域出台了一系列的民生工程和惠民举措,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方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真正做到了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坚持发展依靠人民,是40年小康社会建设能够始终获得不竭动力的重要源泉。在任何时候,发展的主体都是人民,40年小康社会建设之所以取得成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了人民群众在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是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自发实行大包干,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唤醒了农村沉睡的巨大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也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开始在本乡本土发展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生长起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迁。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开始登上了时代的舞台,他们在创造财富、贡献税收、吸纳就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倒逼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发生了与时俱进的转变,使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以一个崭新的姿态进入到了新的世纪。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被进一步发掘出来,各类“创客”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激发着经济的活力。在信息时代,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正在重构着人们的生活,也在改变着世界的格局。互联网经济以其开源化的技术、草根化的平台,吸纳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的聪明智慧,充分发挥出了人民的首创精神,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使中国在这一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同时,作为一种以规模报酬递增为特点的经济形态,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对市场规模有着显著的依赖,而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在这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凭借规模优势,中国更是在共享经济领域引领着世界潮流,不断创造着互联网经济的中国奇迹。

(三) 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中共中央编译局,2012)。从40年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来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保持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所有问题的核心依旧是经济问题,只有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协调推进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2014)。在40年小康社会建设历程中,正是由于我们很好地把握住了将经济发展始终放在各项事业中的首要位置这一重要原则,才使得小康社会建设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使得其他方面的发展获得动力源泉。

经济建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处于核心地位。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是在40年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在这一过程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方针从来都没有动摇过。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第一次论述小康社会时,所提出的发展指标就是到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在当时,这一经济发展指标的设定是对标当年日本的人口和人均收入提出的,即若能在世纪末达到人均1000美元,基于10倍于日本的人口,则在总量上就能与人均10000美元收入水平的日本相当了(邓小平,1994)。自此之后,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小康社会阶段性目标的设定,都以经济发展指标为基础,而每一次回顾总结小康社会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时,也都以经济发展指标的实现与否为目标是否实

现的最主要判定依据。经过过去40年来两个“三步走”前两步的完成,三个GDP“翻番”目标的实现,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稳居世界第二,在人均收入水平上也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门槛。未来,我们将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为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夺取新的胜利。总之,始终坚持经济发展在全面小康社会总体布局中的基础地位,以经济发展作为衡量小康社会水平的根本指标,并坚决完成设定的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我们宣告40年小康社会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功的底气的重要来源。

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不动摇,是我国在40年的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能够不断克服艰难险阻,应对各种挑战,跨越发展陷阱的重要法宝。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体制转轨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对外开放过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的混乱,我们坚定地把握住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使改革开放进程得以继续推进,并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柳暗花明。世纪之交,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积累的国内社会矛盾,我们坚持推进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迎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为解决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赢得了空间,也实现了从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建设的转型升级。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GDP增速持续下行,各种隐性风险日益凸显,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决胜阶段面临重大挑战。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作出了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正确判断,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刀阔斧地实施“三去一降一补”,并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追求高速增长调整为追求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五大新发展理念。经过几年的砥砺奋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初现成效,系统性风险实现了总体可控,发展新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近在眼前。

(四)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目标导向

40年小康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目标导向。从最初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康”目标的设立,到后来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目标调整,再到对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性目标的设定和调整,处处体现了我国在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遵循发展规律、尊重历史经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工作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做工作就要以稳求进、以进固稳,我国40年改革开放是全面的,也是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2017b)。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的小康建设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的目标导向和工作方式,才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行稳致远,走向成功。

将“四化”目标调整为“小康”目标,为小康社会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如前文所述,小康社会实际上并非我国设定的第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国家战略目标是建设“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将“四个现代化”分成“两步走”,即第一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15年时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显然,当时间来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按照这个“两步走”战略,要在世纪末实现第二步的“四化”目标,已经不切实际。鉴于此,邓小平同志对这个目标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调整,不再提“四个现代化”,而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取而代之,同时,将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初级形式的描述“小康”运用到当代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设定上来,用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状态来描述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描绘了一个美好而又相对现实的前景。小康社会建设的序幕正是在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的目标导向下拉开的。

先“总体小康”再“全面小康”,对小康社会的内涵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丰富完善。在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之后,经过了20年左右的努力,到20世纪末党的十五大召开时,我国提前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在不断爆发。由于一直以来片面地关注经济增长,对社会民生、生态环保、职工权益、军队国防建设有所忽视,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共享发展等方面欠账较多,贫困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较弱,尤其是一些事关人民生存权利的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和医疗方面走了弯路,实施了商品化、产业化。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普遍感觉不平等、不舒适、不安全。显然,这样的小康生活和最初对小康社会的理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党

的十六大上,中央基于人民的小康生活仍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这一基本现实,没有急于宣告“小康”任务的完成,而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重新设定了一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提出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建设惠及全民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了“小康”目标的升级。

两个“三步走”、三个“翻番”,循序渐进地推动小康社会向更高水平升级。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小康社会目标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出现,当时中央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设定是要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总量的基数较低,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时,这个“翻两番”和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目标就已经基本实现了。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时,中央设定了新的“翻两番”目标,即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显然,在更大的经济总量基数下,这个翻两番的目标比改革开放初期的翻两番要更有挑战性,但同时,它也是在充分考虑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作出的,是有足够的现实依据和实现可能的。应该说,这个“翻两番”目标的设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时,基于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到攻坚期的条件,中央再次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翻番的目标,即要到2020年,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再翻一番。应该说,这个翻一番目标的难度绝不亚于前一个翻两番。因为从经济增长实际来看,2010年的GDP已经比2000年翻了1.56倍^②,因此,要在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实际的翻番要求要比相对2000年翻两番更大。尽管要求更高,但这个目标是在综合考虑初始战略目标、资源禀赋限制、社会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的基础上提出的,事实也证明,这个翻一番的目标的设定完全符合实际,并成为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战略安排。

(五)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根本途径

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几乎与小康社会的建设同步发展。应该说,正是改革开放推动小康社会建设持续向前发展,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也正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功;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是40年小康社会建设不竭动力的来源。

万事开头难。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小康社会建设的起始阶段,对于到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在当时很多人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因为这需要连续20年保持经济增速在7%以上。对于人口庞大、幅员辽阔的中国,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并保持高速增长,谈何容易!然而,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了中国经

济的风帆:农村改革的一声惊雷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农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解放了束缚在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掀起了改变中国城乡和产业结构的民工潮;经济特区的横空出世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借助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将中国经济送上了快车道。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很快解决了温饱,并向着总体小康社会的目标大步前进。

改革是涉险滩、啃硬骨头,开放在带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放进了苍蝇蚊子。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体制转轨带来的市场乱象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流毒对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对小康社会建设造成了冲击。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也经历了一场影响重大的政治风波。伴随着经济社会危机的是人们对改革开放道路的质疑和对建设小康社会信心的动摇。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给改革开放带来了又一个春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分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社会事业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领域的改革和开放举措纷纷出台,新一轮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小康社会建设水平也在持续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我们不能否认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但是不能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来否定、质疑改革,事实上,在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并不是源于改革本身,而正是因改革的不彻底造成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各方面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新高度。全面深化改革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为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在重构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对外开放新体制等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都取得的突破性的进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够如期完成提供了决定性保证。

三、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是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阶段”战略安排中第一阶段战略安排的起点。40年小康社会的建设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为我们下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坚定了成功的信心。

(一)用“发展”提供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40年小康社会建设能够不断地攻坚克难、取得成功,主要仰仗的就是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增速放缓,对于未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还要不要GDP增长率的问题,在理论界和政策界开始有了争论的声音。诚然,在经济基数已经较大的情况下,再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速的确有很大难度。但是,按照“三步走”战略目标以及“两阶段”的战略安排,要到21世纪中叶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是无法实现的。作为中等发达国家(地区)的典型代表,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在当先的人均GDP平均约为4万美元,而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万美元,也就是说,在未来30年我们要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使这些发达国家(地区)的人均GDP保持不变,至少还需要中国实现人均GDP翻两番。这相当于要以7%的年GDP增速持续增长20年。因此,为了如期完成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我们必须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在合理区间,决不能放弃GDP指标,依然要继续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这个做好一切工作的牛鼻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

继续推动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时,很多人曾质疑中国能否实现“翻两番”的目标,而中国经济在随后所爆发出来的巨大增长潜力有力地回击了这种质疑。当前,尽管经济增速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向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在,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继续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潜力。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些高端产业领域的供给不足也为这一领域的投资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其次,作为一个正在经历体制转轨国家,各领域体制机制的改革仍然方兴未艾,制度改革红利的释放也将为经济发展提供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再次,作为一个正在经历结构变迁的国家,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刚刚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5%,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仍然有很多短板有待弥补;最后,作为一个绿色发展理念刚刚被人们所接受的国家,在生态环保、防止污染方面的需求日益提升,环保产业也必然将成为未来吸引投资者的热土。发展中的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如果能有效地抓住发展机遇,克服困难挑战,再实现10年以上的中高速增长,为建设现代化国家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二)用“改革”破除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险阻

40年小康社会建设能够克服一系列艰难险阻,持续推进,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是重要的法宝。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仍然要不断深化改革。然而,现阶段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彼时的改革在逻辑上是拨乱反正,在行动上是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历了十年动乱、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时候,破旧立新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共同的心声,改革自然也是一呼百应。而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则与40年前截然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2014)。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正是由转轨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积累所倒逼的,而在持续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又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在改革开放已经40年的今天,各社会群体和阶层都已形成了日益固化的特殊利益,并且很多既得利益的形成正是基于制度的不完善和改革的不彻底。因此,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对于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向什么方向推动改革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甚至存在尖锐的矛盾对立,使得在改革进程中,“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杨刘保,2018)。

但是,如果将改革半途而废,或只做表面文章而不深入推进,那么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很难真正实现,或者说即使如期建成,也是不稳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更是空中楼阁,人民生活水平即使超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也存在重新跌入陷阱的可能。所以,我们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改革要讲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将“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相结合,加强各项改革之间的协调配套,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协调好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坚持问题导向和调查研究,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在改革方案制定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使更多的人支持改革,合力推动改革。

(三)用“全面”引领现代化道路的前进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面”二字。“全面”首先体现在覆盖领域的全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生动地描绘全面小康社会的图景,他强调,我们即将建成的小康社会是一个城乡统筹发展的小康,是一个物质文明与精神力量协同增强的小康,是一个政府官员诚实守信、公正廉明的小康,是一个让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小康,也是一个青山绿水环绕的小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只有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展,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拥有获得感、满足感。“全面”还体现在覆盖群体的全面,城市和乡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都要全面发展,不能顾此失彼。特别是对于“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人口,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着力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消除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正是由于将小康社会建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小康社会才成色十足。

鉴于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唯有坚持用“全面”指导发展方向,才是能够继续攻坚克难、获取新的胜利的关键保障。用“全面”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核心还是要坚持覆盖领域的全面和覆盖人群的全面。一方面,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维度越来越多元化,这也赋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多元化的内涵。在未来几十年中,现代化当然要包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内容,但人民对美好生活更高的和更多元化的诉求也很有可能进一步丰富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外延和内涵,使得现代化的全面程度进一步超越全面小康社会,达到更高的水平。这更需要我们与时代同步,随时根据人民的诉求变化而调整完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即使是实现了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门的自然、历史、社会条件依然差距很大;即使消灭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落后的现象也依然将长期存在。在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时刻关注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等问题,使现代化真正成为覆盖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和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现代化。

(四)用“质量”设定现代化水平的更高目标

当前,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已接近1万美元,距离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仅有一步之遥,而能否顺利超越这一发展水平并持续稳定地发展,决定着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国际经验上看,20世纪中叶以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甚至还有一些国家在已经跨越了高收入门槛后,又重新退回到中等收入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凡是在完成了高速发展赶超阶段后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并稳定在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都是能够

在发展质量上迈上新台阶,从而使本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上处于优势地位,使国内经济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社会和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的。与之相反,凡是在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快速追赶后,未能持续稳定地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都是发展质量不能明显提升的经济体。甚至可以说,发展质量不高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于发展的质量不高,这些经济体在到达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普遍面临传统的增长动力丧失,新的动力缺乏的问题,而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开始爆发,并使国家陷入频繁的政权更迭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之中。

对中国来说,在40年的小康社会建设中,我们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生产要素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实现了飞速的经济赶超,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我们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和相对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人口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大大优化,人类发展水平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的较高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的发展速度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质量上存在的短板也相当突出,产业结构上的缺陷、技术瓶颈上的制约、城乡发展上的不平衡、区域发展上的不协调以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方面的问题和矛盾,已经日益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严重阻碍。实事求是地讲,40年小康社会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总体上仍然是在“量”上的要求,对于经济发展的质量要求还体现得不明显,在规划中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设定和在实践中检验阶段性目标是否达成的标准,都以GDP翻番为主,而对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的设定并不突出。

鉴于此,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坦途,唯有解决质量的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一转变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张军扩等,2019)。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创新,关键是要通过营造一个有利于促进创新的生态系统,建成一个能够承载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首要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只有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窘境,我国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和经济强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为此,我们要在研究与开发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的研发加大支持力度,引导社会力量提高对基础性研究的关注,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开展或投资于基础研究;要重视与基础研究相关的学科建设,完善科研人才的成长环境和培养机制;特别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整合各类创新资源,优化创新协同机制。此外,建设创新型国家还要倡导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环境。可以说,创新是一种文化现象。创新文化是一切创新的精神源泉,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基。没有创新文化,整个社会的创新就会受到压抑和阻碍。当前我国需要着力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和担当精神;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失败,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激发创新潜能;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创新创业生态,激发创新活力。

(五)用“美丽”扮靓现代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作为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一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难题。我们在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虽然有意识地避免重复部分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思想观念等主客观原因,还是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由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党的十九大把“美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起列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是一种民族自觉,更是一种大国责任。说是民族自觉,是因为中华民族历来信奉和遵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从而铸就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辉煌。正所谓:“生态兴文明兴、生态衰文明衰”。说是大国责任,是因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共同梦想,环境危机成为全球挑战。当前,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我国能够为解决事关人类发展与安全的重大问题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我们要深刻认识我们在环境保护中的不足,花更大力气解决已经出现的突出环境问题,合力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和环境挑战,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

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因此,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习近平,2017c)。

当然,建设美丽中国也并非易事,需要有决心,更需要有行动。其一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环境问题入手,全力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管制和修复“三大战役”,彻底擦去祖国母亲“脸上的污垢”。其二要积极推进绿色发展,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积极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进而从源头上推动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减少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减少生态破坏;要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面向市场需求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转化、推广,用绿色技术改造形成绿色经济;要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推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要积极推进生产和消费革命,紧跟世界能源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要积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节约能源的基本国策,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的生产方式,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进而让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公民都能够自觉为美丽中国建设作贡献。其三要谋划建设美丽中国的长远大计,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要尽快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用最严格的法律、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围绕主体功能区规划完善相关的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环境等政策,保障主体功能区制度落到实处;要坚决制止和惩戒破坏生态环境行为,让破坏环境者付出代价,进而加快形成不敢且不能破坏环境的高压态势和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责任编辑:李逸飞)

注释

①数据来源: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数据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测算得到。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2)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
-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
-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a。
-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b。
- (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c5月28日。
- (10)杨刘保:《改革开放40年来建设小康社会的逻辑理路》,《新疆社科论坛》,2018年。
- (11)张军扩、侯永志、刘培林、何建武、卓贤:《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战略路径》,《管理世界》,2019年第7期。
- (12)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
- (1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a。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b。
-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c。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d。
-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 (22)中央文献研究室小康社会研究课题组:《小康目标的提出和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党的文献》,2010年第1期。

Building a Xiaokang Society in China: History, Experience, and Prospect

Han Baojiang and Zou Yina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Administration)

Summary: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Masayoshi Ohira in December 1979, The concept of “Well-off Society” was firstly proposed by Deng Xiaoping, who initiat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78. After that, the Well-off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as a phased strategic goa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last forty-years, the progress of developing “Well-off Society” has experience four significant stages in China. The first stage was that “Well-off Society” was officially proposed a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prior 20 years that follow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y,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national defense, called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had always been the strategic goal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for a sorts of reasons, those goals were too hard to reach in the late 1970s and “Well-off Society” was proposed a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which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reuniting the consensus of the Party and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The second stage was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from food and clothing to a well-off society. China has comprehensively solved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 in 1990 and reached a well-off level of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 of \$ 1,000 in 2000. This is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for China to overcome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the 1980s and 1990s. It also played a vital role in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in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style. The third stage was the transition from “General Well-off” to “All-round Well-off”. Since the “General Well-off” achieved in 2000 has a lot of debts in the areas of social livelihoo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ional coordination, urban-rural sharing, employee rights, and military defense, the construction of a “All-round Well-off” must reach a higher level and cover more comprehensive areas The crowd is moving, or this is an upgrade of the “Well-off” The fourth stage is from “developing” to “developed”. The difference of these words demonstrates the Party’s confidence to deliver the “Well-off Society “promise as scheduled, and the Party’s determination in its further leading the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socialist modern and real powerful country.

“All-round Well-off Society” march has left us a host of experiences. The first point is to always adhere to the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is the “direction guidance”, “theoretical arming” and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Well-off Society. The second point is persisting on the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philosophy, which is reflected in sticking to development for the people and relying on the people. The third point is to insist rotate around economic developing. Economical developing should always be positioned in the center of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advancements, namely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contained in the building of Well-off Society. The unswerving centrality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is the magic weapon for China to to overcome the all difficulties and hazards, to meet all kinds of challenges, to surmount the development trap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 fourth point is always adhering to a gradual goal orientation. Chinese has a saying goes like “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well-off society, it is reflected in the adjustment of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goal to the “General Well-off” goal, and then the “All around well-off”. “Comprehensively prosperous” and set two “three steps” strategy and three “doubling” goals. The fifth point always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approach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enabled China to successfully achieve economic take-off, rapid growth, an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are continuing to guid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and deepening reforms.

Keywords: well off society; 40 years;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modern country

JEL Classification: F0-0,01